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路径探讨

■ 牛天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次创新性实践。这一制度旨在充分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以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现代化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它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相结合。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路径，着重考察中国在实践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适应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演进可以追溯到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适应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积极适应了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发展需求，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拒绝市场经济，而是通过将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计划相结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创新性举措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成功融合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

特殊经济区域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特殊经济区域，如深圳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并推动经济改革。这些地区的成功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发展外贸等一系列举措。这些政策的实施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融合，将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通过上述创新性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适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渊源。中国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基础。随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事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领导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挑战。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产生了动荡，但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路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断发展和适应的产物。这一历史渊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也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持续传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对其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适应与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通过现代化的建设和全球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过程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双重逻辑

■ 黄婷婷

“两个结合”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结晶，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和途径，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一、“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运用中，需要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而是需要在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灵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根据不同的现实境遇灵活运用，现实境遇不同，运用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会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不同结果。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经验，对“两个结合”的发展形成存在一定的理论逻辑。“第一个结合”的观点正是对马恩列思想经验的汲取和拓展，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和策略，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之，将马克思主义与各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结合，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高度契合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来源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从理论特征、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高度契合。首先，从这两者理论特征来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展现出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特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精华，丰富和发展自身。同样，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品质，始终关注时代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理论的有益成果。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其次，从这两者的精神气质来看。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具有相似之处。对于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相生”“福祸相依”等理念，体现了对事物相互转化和变化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强调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两者都承认事物的动态性和变化性。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重视实践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知行合一”，认为知识和行动应当相互结合、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则将实践视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从这两者的价值观念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愿景，描绘了一个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社会愿景。马克思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社会，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和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逻辑

(一)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让马克思主义这棵真理之树在中国本固枝荣，必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与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审美观等核心要素，蕴含着思想观念、政治观点、

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哲学思维等，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还能激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发挥着重要的时代价值。积极挖掘和阐发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充分吸收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究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筑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更好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团结和带领全民族推进“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谋富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六个必须坚持”，第一个“必须坚持”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意味着“两个结合”要从人民需求出发，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形成人民群众所能认可和践行的理论。纵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作为贯穿“两个结合”的重要主线，人民群众既是“两个结合”的力量源泉，也是“两个结合”的受益者。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人民群众始终处于“两个结合”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也为“两个结合”指明根本的发展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是推进“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能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还能使“两个结合”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激发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出场与演进

■ 王康标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生成，体现了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实践和理论剧烈变革的深刻洞见，其演进轨迹伴随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不断深化。准确把握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出场语境与演进轨迹，对于推进五种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出场语境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出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状态的精准把握，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勃兴的现实境遇和理论考察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关注转移。

(一)机器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勃兴

18 世纪中叶，已经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英国资产阶级率先发起并完成以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产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工具的深刻变革和巨大的技术进步，建立起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生产系统。产业革命的历史性突破与机器化大生产的全面确立，不仅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臻稳固和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新兴阶级的逐步形成，更深刻地重构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对抗性本质关系。“局部工人”转型为“总体工人”，劳动者不仅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任何形式控制，更在生产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中沦为“机器的活附属物”，表现为工人必须严格遵循机器体系的机械节奏，劳动内容被降格为“纯粹抽象的机械运动”。自动化的机器生产体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了相对剩余价值榨取，并在技术革命的表象下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隐蔽剥削。此外，资本通过将妇女儿童童仆雇佣劳动体系，不仅瓦解了前资本主义的家庭生产单位，更实现了对劳动力价值的双重掠夺：一方面，家庭内部的无酬家务劳动被整合进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童工制的普及使工人家庭陷入“代际贫困循环的深渊”。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考察从流通转向生产

从 17 世纪中叶起，相继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逐步取代封建生产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也逐渐取代此前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商业资本而居于统治地位。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更引起了理论的变更。作为产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表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将理论视野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考察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威廉·配第首先将理论关注转向农业生产领域，他指出：“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土地上栽培谷物……我认为，这个人从他的收获之中，扣除了自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块土地一年的自然的真正的地租。”此外，法国重农学派也将目光从流通转向生产，认为物质产品、使用价值来源于农业生产。亚当·斯密对剩余价值形式的考察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利润范畴，并将利润和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基本形式。古典经济学家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剩余价值这一范畴，只是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利润、利息和地租等，但是他们将理论关注投向生产，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形成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演进轨迹

《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困惑，引导着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深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实现了生产理论的伟大革命。

(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解答异化劳动的初步阐发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涉及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原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粗陋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工人劳动生产的异化劳动理论，从而将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由“市民社会”转向“生产劳动”领域，这一研究探索的转向孕育着全面生产思想，成为建构全面生产理论的初步尝试。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

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实现了共赢局面。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应用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模式。这对于那些希望实现现代化并维护主权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路径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且不必丧失文化特色和国家主权。这种全球化传播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

(三)非洲、拉美与亚洲国家的发展合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非洲、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积极开展发展合作，包括投资基础设施、提供援助和开展贸易。这种合作有助于加速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减轻贫困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互利合作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支持这些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促进全球减贫和经济增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文化传播以及国际发展合作，中国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益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平等和繁荣的国际社会。

四、结语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产业升级、农村改革、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举措，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发展中扮演了积极角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和全球化传播等方式，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合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and 范本。

(作者单位：中共沁县县委党校)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困境与机制创新研究

■ 魏嘉锐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引起了广泛关注。2024 年我国人口总量连续第三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持续徘徊在 1.0 低位。当前，低生育率的现象已不再单纯由死亡率主导，而是更多地受到了功利性生育意愿下降和生育成本制约的影响。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破解“不愿生、不敢生”的深层困局，以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生育率下滑归因多元

近年来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认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结婚率与生育率越低，因此应该提高女性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门槛。首先，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实行生育门檻的基本国策；其次，这种观点十分片面。不可否认，我国的低结婚率、低生育率与逐步提高的女性受高水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但致使我国结婚率和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女性教育的不断深入，女性意识逐步觉醒，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在此背景下，诸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而囿于家庭，致使自身社会价值难以充分实现，进而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当然，生育并不是女性单方面决定的，生育率低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承受的生存压力有关，例如，养育成本高昂和房价飙升的经济因素、职场压力和生活节奏加快的社会因素。2021 年我国正式出台了“三孩生育政策”，各地积极完善生育支持体系，通过一系列配套措施，如生育及育儿补贴、生育保险福利、育儿假期延长等，旨在减轻家庭在生育、养育及教育方面的经济负担。然而，当前的支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从经济学概念上，理性经济人完全依照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行动和决策。假设女性是理性人，那么身处不完善的教育休假和生育补贴制度之中，女性难以做出生育的决策。

另一种片面的观点，简单化地把人口出生率下降归结为我国曾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对遏制我国人口过快膨胀、推动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力地减轻了人口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造成压力，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铺设了良好

的基石。然而，若仅将当前人口出生率的下滑简单归结于这一政策，则忽略了背后更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演变及人口结构深层次调整的多重因素。

二、赋权于民与赋予生育价值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友好型社会，本质上是指在一个社会环境中育龄女性能够在充分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主动认知并积极响应国家制定的生育政策，形成一种自觉的社会风尚。在这种情况下，生育的尊严和价值将被广泛认可，生育权益和生态环境将得到坚决的保护。

在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首要之举在于“赋权于民”，确保生育权利真正回归到每个家庭，这是激发当代适龄女性尊重并珍视生育社会价值的重要前提。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每位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现在有些女性坚持不婚不孕以追求自身的独立和女性平权，我们尊重她们有自主选择权利，但女性没必要因为要实现追求某项权利而以牺牲另一项权利(生育权)为代价。“赋权于民”实现的核心在于让生育决策回归至家庭内部，由夫妻双方共同商定孩子的诞生时机与数量。强调生育权回归家庭，并非意图削弱党和国家在人口战略规划中的引领作用，而是倡导不再依赖法律或行政的强制性措施来约束个人的生育选择。这要求将重心转移至优化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通过正面引导和合理调节，帮助适龄女性及家庭清除生育决策过程中的障碍，从而确保生育行为基于自主意愿与自由选择。

此外，我们需致力于“赋予生育价值”，确保生育成本的合理分担，这是激励当代女性珍视生育社会价值的必要条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生育是一项损己利人的事情，即生育过程中的成本主要由个体承担，而其带来的益处则广泛惠及子女的成长、社会的延续以及国家的发展。鉴于此，单纯要求女性为他和人和社会的利益而承担生育责任，似乎是一种“非分之请”。要使这一要求变得合理且可行，关键在于在“赋予生育价值”，通过政策扶持、资金补助、待遇提升等多维度措施，大力支持女性的生育行为。此举旨在转变当前生育成本主要由单个家庭独立承担的局面，致力于逐步缩减并最终消除生育投入与所得回报之

间的显著差距。

三、生育的情绪价值

当前，我们常常过于看重工具理性层面生育行为所带来的利弊，其实生育还涉及更多精神层面的价值。情绪价值，即他人的语言、行为等对某个个体情绪的唤醒，这种情绪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生育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石，自古以来就承载着延续生命、传承文明的重要使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生育始终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古代的多子多福观念，到现代的优生优育理念，生育始终被视为一种神圣而伟大的行为。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生育观念，使得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

“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体现了情绪价值的重要性。这种观念源于对家庭、亲情和未来的深切期望，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考量，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和保障。从情绪价值的角度来看，“养儿防老”意味着在晚年生活中，子女的存在本身能够成为父母的精神支柱和情感慰藉。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可能会面临身体机能的下降、社交圈子的缩小以及生活节奏的变化等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的陪伴、关心和照顾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至关重要。子女的存在不仅可以让老年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晚年生活，减轻孤独感和无助感。此外，“养儿防老”也体现了父母对子女成长和未来的期望。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健康成长，成为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当子女在成年后能够回馈家庭、照顾年迈的父母时，这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也是对他们情感投入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和认可对于父母的情绪价值来说，是无比珍贵的。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而生育友好型社会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利益的必然选择，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人民安全的重要举措。它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还有助于积极应对我国目前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单位：大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